

“社会科学在什么意义上能够成为科学”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谢梅 傅 翀

2018年5月12日至13日,“社会科学在什么意义上能够成为科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电子科技大学召开。会议由电子科技大学数字文化与传媒研究中心主办。来自中国、美国、法国与墨西哥的十余位学者以及来自电子科技大学的二十余位师生参加。电子科技大学数字文化与传媒研究中心蔡华教授、谢梅教授、傅翀研究员,美国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荣誉教授麦克洛斯基(Deirdre Nansen McCloskey),墨西哥社会人类学研究中心维多利亚(José Luis Escalona-Victoria)教授,复旦大学哲学系魏明德教授(Erenlai-Benoit Vermander),分别作了主旨演讲。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倪得兵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研究》编辑部刘海涛副研究员、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徐新建教授、电子科技大学大数据研究中心周涛教授、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韩洪教授担任评议。与会学者还有中国传媒大学丁岩妍,中国社会科学院林红,兰州大学刘宏涛,同济大学陈晋,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林科吉,四川大学张帆、张琪,昆明学院澜清等。

2016年11月,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与电子科技大学数字文化与传媒研究中心曾联合举办了同名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是对上次会议的承接与推进。在上次会议中,大部分与会学者虽然批判了传统科学观所强调的绝对客观与普遍有效,认同“社会科学在什么意义上能够成为科学”这个命题实际上是“唯科学主义”时代的思考结果,但并没有在“科学应该如何重新定义”上达成一致。是否存在一种新的科学观,可以真正沟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这一问题自然成为此次会议的核心议题。社会科学从诞生伊始就自觉或不自觉的开始为自己学科的意义进行辩护。同时,由于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在人类知识累积上所获得的绝对统治地位,社会科学的这种辩护变成论证自己与自然科学的同构性或者相似度,而社会科学也的确在研究方法以及表达方式上趋近了这种“科学性”。但是,随着科学本身的演化,以及科学哲学及科学史对“科学性”的不断批判,再加上社会科学工作者对自己学科性质的反思,因此又到了不得不追问科学是什么,社会科学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被称作是科学的时候了。

1. 对“科学”内涵的再认识。这次会议的举办,事实上也是为了更好地回答“科学是什么”这个问题。要辨明这个问题,很多与会学者首先对“科学”的定义进行了反思。在这一点上,大家达成了共识,即目前在人类知识领域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科学观实际上是一种狭义的关于科学的理解。蔡华开宗明义地讨论了社会科学迄今没有彻底获得“科学”的地位,正是源于一种对“科学”的自然科学式的狭隘理解,而随着这种狭义的科学观对广义的科学观的逐渐垄断,一种妨碍社会科学发展的“科学主义”也就应运而生。麦克洛斯基认为,在英语世界中,“science”(科学)的涵义被限制在物理学和生物学范畴内,而这种涵义的窄化是来自1876年出

版的《牛津英语词典》中对“science”的解释。当时之所以有这种解释,是由于牛津剑桥学术政治中关于确立化学教授职位的一个偶然事件,但由此带来的对“科学”的狭义理解深远地影响了世界。维多利亚指出,科学并非代表了永恒真理因而一成不变,相反,科学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模式,而最近的科学模式则是一种机械论式的,他总结道:“自启蒙运动时期以来,甚至在此之前,最流行的科学模式都是建立在数学、力学和生物学的隐喻之上。关于宇宙的运行方式的解释必须也可以处理能够综合一般知识的数学公式和数学表达。”

2. 狭义的科学观及其在社会科学中的实践。在批判了通行的“科学”概念的局限性之后,与会学者转而开始讨论这种狭义的科学观对社会科学造成的影响。麦克洛斯基认为,这种狭隘的科学观使得目前在经济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的是行为主义者、实证主义者所走的量化的道路,而忽略了人文主义可以带来的认知的、解释学的、定性的道路。维多利亚指出,这种狭隘的科学模式最早经由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引入对人类行为的理解之中,并持续影响后世,比如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和爱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等人的研究。这种机械论式的科学观并不会反思自己知识的局限,从而导致过去的一些技术在没有考虑到其长期使用后果的情况下就得以推行,并已带来恶果,而社会科学家会沉迷于寻找可以一劳永逸地解释一切人类社会行为的一般规律。蔡华则认为,在这种狭义的科学观的影响下,社会科学家,比如涂尔干与韦伯(Max Weber),都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也是物质的。在蔡华看来,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实际上并不是物质性的。要讨论社会科学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成为科学,首先要解决的是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问题,而这个对象就是信仰。信仰是非物质性的,因此在这一点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也就构成了区别。魏明德也提到了涂尔干的作品,他认为涂尔干狭隘的科学观导致他的社会学研究包含了一种先入为主的假定:合理社会秩序应该符合某种样子。而一旦有了一种理想中的社会的模板,具体的个人的声音就容易被忽略。周涛在评议中指出,科学虽然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信仰体系,但与宗教是有区别的,对宗教的信仰有深浅的区别,但对科学的信仰,比如对求真信念的信仰,必须是纯粹且完全的。倪得兵则认为,对科学的定义应该在形式逻辑的体系下赋予其意义。

3. 新社会科学的科学观的反思与重构。与会学者批判了对“科学”的狭隘理解,分析了这种狭隘的科学观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误导与制约,同时也提出了应对的方法,以及还需警惕并持续批判的方面。在持续的讨论中,麦克洛斯基认为,旧式的经济学实际上并没有站在人性的立场,因为这种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在于20世纪20年代以来奥地利学派所代表的那种“狭隘的实证主义”,他们将“理性”理解为非人性的。她认为这样的经济学只是貌似科学,在忽略了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类的行为之后,只会导致经济学的不科学。所以她提议让人文学科能够走进经济科学。蔡华进一步阐释了社会科学成为科学的首要条件是明确研究对象的实体。他将人类大脑或神经元的所有活动都还原为四大类原理,即认知原理、形式逻辑原理、再现原理、信仰原理,而信仰原理是居于最核心地位的原理。在信仰与行为之间,存在着严格对应的因果关系,也正因为此,信仰作为一种实体,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蔡华认为,在以量子力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承认了不确定性之后,以人类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将会在人类知识领域重新夺回确定性,而这也就是对决定人类行为的“信仰”的发现与研究。维多利亚则认为,首先应该观察到科学的模式也已经有了新的发展趋势,即自然科学家也开始承认宇宙的复杂不可预测性并不是因为人类观测方式的落后,而是因为宇宙本质上的复杂不可预测性。他认为,人类学民族志的方法虽然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在科学和知识中的普遍主义,但关键在于,如何从复杂又混乱的

日常事物中丰富和阐明我们对整体情况的确定和疑虑。在维多利亚看来,虽然本次会议的议题本身与目前流行的机械论科学观是一致的,但这个科学观本身是需要反思与补充的。因此他提醒听众考虑人类学和艺术的关系,并认为艺术应该成为科学中的一种行为研究模式,这种对艺术的重新理解也可以对科学过程进行批判性重塑,从而更好地达到科学目标。傅翀则反思了时代与科学性的问题。他征引了胡适在科学的谱系学指导之下的“国故整理”运动,其实质却导致了“国故”的肃清,来说明科学本身的科学性并不一定导致科学的成果,学者必须清楚科学的使用与滥用在具体时代背景下的明确划界。在评议环节,刘海涛认为,维多利亚立论中体现的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在科学化时代各自所面临的科学性张力反而助推了各自的发展。他指出,知识本身具有两种机能属性,一种是科学性,一种是社会性,这种划分是理解上述张力的一个理论支点。他强调,社会科学对科学性的探索,应该接受后现代思潮的洗礼,但不应该迷失于后现代主义之中。徐新建也提醒大家警惕科学的价值中立实际上是一个可被操作的原则,同时他指出,人类获取知识的途径不应仅仅限于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方法。韩洪接续了蔡华的讨论,认为我们应该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两方面去寻找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同时,他结合传播学研究,指出精确的表述方式也是社会科学成为科学的必要保障。刘宏涛反思了科学方法中对事物的绝对抽象与概括在应用于与人类相关的知识(比如语言)时,是否是合理的。他认为,从抽象的理论直接提炼出对人类历史的认知是错误的。陈晋也提醒与会学者在近代一种所谓“科学方法”的兴起背后,有其西方哲学的基础。谢梅则认为,传统的科学性所要求的数学化,不仅让社会科学不断自我改造为量化的研究方式,而且也让社会科学在对人类社会进行研究时追求一种单一的解释原则,但社会科学恰恰应该是一种对人类的社会生存进行不断研究与追问的学问,它的科学性存在于对人类社会多样化与不可预测性的承认之上。

与会学者围绕“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展开激烈讨论。学者们一致认为,人类对自然的概念性把握,以及对这种把握的语言表述,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换言之,科学研究只要是一种概念性的认识,是一种反映性的思维,那么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反思其中蕴含的局限性。今天讨论社会科学的科学性问题,必须基于对人类社会复杂性的体认以及对人类活动丰富性和变化性的承认,并且应该将讨论建立在对人类语言局限性的理解以及对社会规律适用限度的反思的基础之上;如果只是在传统科学主义式的科学观下想当然地规范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则只会适得其反。

在2016年11月“社会科学在什么意义上能够成为科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批判了旧的科学观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误导与束缚,但是对诸如社会科学的对象是否为一个可以清晰定义与描述的实体、何为科学的研究方法、普遍主义是否适用于研究人类社会等问题存在较大分歧。此次会议上,与会学者大多认同了蔡华的基本观点,即社会科学成为科学的关键是清晰地界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并准确地予以表达。另外,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给出了自己对“科学”及“科学方法”的理解,虽然侧重不同,但在原则上已有初步共识。本次会议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与会学者所提出的新的科学观,强调针对“科学”应该给出更广义,也更符合社会现实和人性的理解,并因此规划了社会科学应该追求的新的科学性。回顾这两次的会议,从“社会科学应当是科学”到“社会科学是科学”,充分展示出社会科学界在学术研究中的推进与跨越,这本身就是对“社会科学在什么意义上能够成为科学”的最好诠释。

(作者谢梅,女,电子科技大学数字文化与传媒研究中心教授;傅翀,电子科技大学数字文化与传媒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地址:成都市,邮编611731) [责任编辑 刘海涛]